

“国际战略研究在中国: 理论、方法与中心议题”研讨会综述

赵建伟

2015 年 9 月 2 日,由国际战略研究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主办的“国际战略研究在中国: 理论、方法与中心议题”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外交部政策规划司、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社会科学院、兰州大学、浙江大学、云南大学等协同、合作单位的官员和专家共计 20 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者就国际战略研究的范畴、理论与方法、国际战略研究与中国战略、地区国别研究与国际战略、全球问题与国际战略研究等议题进行研讨。

一、国际战略研究的范畴、理论与方法

与会者认为,国际战略侧重于全球层面的中长期思考和布局;制定国际战略的目的是为了谋求国家利益、维护国家安全;国际战略的研究范围广泛,但也要有所限定;国际战略研究的方法要注重宏观与微观、学术与实践相结合。对此,与会者从不同角度进行解读。

关于国际战略的内涵,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认为,国际战略是国家为维护主权和安全、促进经济和社会发展,营造有利于本国的国

* 赵建伟: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助理。(邮编:100871)

际环境而制定的综合战略。国际战略不同于外交战略、国家安全战略和对外经济战略,但又与其有密切联系。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副主任唐永胜教授认为,国际战略是指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领域较长时期全局性的谋划,是主权国家在对外关系中运用国家实力谋求国家利益的筹划与指导,其主要表现形态就是国家的对外战略。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杨恕教授认为,国际战略是对国家(主要是大国)、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国际思潮、各类人群乃至个人的存在所造成的局势及其发展状况做出的思考和对策,其核心内容是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方法。一般来说,只有大国才有国际战略。杨恕认为,目前只有美国有国际战略,俄罗斯的国际战略正处于形成阶段,现在还较为模糊。我国所处的情况与俄罗斯相似,正在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国际战略。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于铁军副教授认为,中国对战略的定义与国外尤其是美国相比,较为不同。因此,如何为界定战略是研究战略时首先要面临的课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高级顾问崔立如研究员认为,国际战略研究是在跨学科领域关于冲突与和平的研究,通常关注国际政治、地缘战略、国际经济、军事力量等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吴志成教授提出,国际战略研究应坚持“一个立足”“三个面向”。“一个立足”即立足于维护和发展中国的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三个面向”即面向国家的重大战略需求、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它要求战略研究应具有前瞻性和预测性,既关注当下的现实问题,又关注未来的潜在性问题。

关于国际战略的研究领域和内容,吴志成认为,应当以重点和优先领域为主。他分别从三个维度进行了解读。从时间维度来说,国际战略研究应该是对大战略的研究,重点关注中长期的战略。从空间角度来说,应首先关注全局性的全球战略,其次是大国战略和周边战略。从功能维度来说,重点关注军事安全、外交安全和对外经济战略。中国社科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程卫东研究员认为,国际战略的研究领域应限定在国际安全 and 国家利益等领域。此外,承认潜在冲突是战略研究的背景,也是战略研究的意义所在。同时,战略的制定应建立在充分理解对手或者伙伴的战略谋划的基础之上,判断其对中国和世界形势的影响。于铁军则认为,应当采取“洋为中用”的方式,批判吸收其他国家的国际战略理论与实践。外交部政策规划司副司长杨小茸从外交工作角度,将战略研究的内容归纳为四点:第一,外交理论研究。在新形势下,中国的外交理论要在创新方面下功夫,尽早解决理论跟不上实践的紧迫问题。同时,理论创新需要把握形势和利益,要与中国的总体发展战略相衔接;第二,对外

战略研究。把对国别、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战略研究建成一个体系;第三,重要领域的战略研究,主要包括国家发展的战略空间、能源资源、战略通道、水资源安全问题及全球治理等领域。西方国家在许多新领域提出了新规则,而我们对这些新领域缺乏基本的战略研究,缺少判断这些规则的利害知识,这显然不利于我国参与全球事务。第四,重点难点问题的战略研究,主要包括南海问题、海洋强国战略等。

关于国际战略的研究方法,吴志成认为主要包括五方面:第一,经验研究。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应从已有的国际战略实践经验当中总结和提炼出有价值的规律;第二,理论研究,这方面亟需加强。第三,比较研究,即对当今世界大国的国际战略研究进行批判地吸收,学习他国如何把总体战略的目标转化为具体操作过程,最终建立方法论上的指导体系;第四,预测性和前瞻性研究。应发展基于历史经验的、在科学和理性分析基础之上的,对国际战略的格局、态势进行中长期展望的研究;第五,实用性研究。应聚焦中国面临的重大国际问题。于铁军认为,由于国际战略研究涉及多层面、多领域,因此,应采取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方法。此外,还应探索其他可能的研究方法,进行累积性、连续性的中长期研究。杨小茸结合外交工作的现实情况,提出了国际战略研究方法两个关键点:第一,学术性与实践性相结合。美国战略家基辛格博士的大战略思想之所以能够引起重视,其原因在于实现了学术性与实践性的紧密结合;第二,宏观与微观相结合。在全球性的战略研究和国别区域研究相结合的基础上制定的国际战略才更有指导意义。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教授认为,国际战略研究要首先设定战略目标,因为国际战略的目标设定事关一国对理想世界的憧憬和追求,没有目标即没有努力的方向,也就不能称为战略,而应称为战术。唐永胜从战略哲学的角度谈到,国际战略研究的方法应当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即顺应国际政治发展的大趋势。

二、国际战略研究与中国战略

与会者认为,国际战略研究的立足点是中国战略,也即如何为实现中国的战略目标寻求国际性支持。同时,国际战略研究一定要统筹好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不能顾此失彼。

崔立如从中国战略的角度对国际战略进行解读。他认为,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要从现实需要而非是从理论概念出发制定对外战略。如今在中国影响

力上升及中国外交形势严峻的情况下,从宏观角度对中国战略进行长远的规划和研究尤其重要。他还提出中国战略研究的方向:第一,中国对外关系的重大问题,既有时间上的分期,也有空间上的分野;第二,中外战略互动关系,要分清新形势下互动与旧形式下互动的区别。此外,他还谈到中国战略与国际秩序问题,并强调中国对当今国际秩序的思考不仅要考量本国的外交总体设计需求,而且不能忽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反馈。当前,中美进入战略竞争和博弈期,且今后数十年都将处于这个时期。他建议,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视角出发,同时借鉴古代中国诸如“和而不同”的政治哲学建构国际战略理论,有助于指导外交实践。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翟崑结合“一带一路”对中国的国际战略思维进行分析。他认为,中国的国际战略思维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第一,唯变所适,即根据现实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不断适应新情况。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特点是安全困境、发展瓶颈和治理失灵三个问题的互动及相互制约,“一带一路”的倡议和实施就是针对这种变化所设计的;第二,兼顾矛盾。在“一带一路”实施的过程中,应特别注重协调中央与地方、国内与国际、政治与经济、发展与安全的矛盾。他认为,就目前来看,发展与安全之间矛盾的协调明显不足;第三,突破困境。对中国来讲,突破困境的意义在于既要维持发展和崛起的态势,又要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从这十几年崛起程度来看,中国面临的矛盾张力越来越大。出路在于第四即适应性共赢。各国为了寻求共赢,要相互适应,在适应学习的过程中走向共赢。他建议,适时评估“一带一路”倡议的最新发展情况,在这个过程中建立适应性更强的战略思维,储备战略人才,进一步指导和参与“一带一路”的实施。

杨小茸着重分析了中国外交与国际战略研究之间的关系。她认为,中国外交需要国际战略研究,并且国际战略研究对外交工作的重要性也在逐步上升。中国面临的外交形势非常复杂,把具体的外交工作放到整体的战略中去思考 and 设计是未来的主要方向。她还谈到,国际战略研究的要素包括战略目标、战略布局、战略手段、战略策略和战略支撑。国际战略研究应具备全局性、前瞻性、理论性、务实性等特点。针对外界关于“一带一路”是倡议还是战略的疑问,杨小茸进行了释疑:从对外的角度来讲,“一带一路”是一个有关共同发展的倡议,通过互联互通建设,实现沿线国家的共同发展。然而,“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必然会带来战略性的影响。如果“一带一路”进行顺利,将有利于改善未来 10—20 年中国的战略环境。

在国际战略研究的内外关系上,与会者取得了共识。贾庆国认为,国际战略研究应同时考虑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教授认为,国际战略研究要建立在对本国不断反省和改造的基础上。从内外兼修的角度设计大战略才能事半功倍。杨小茸谈到,国际战略研究不能只顾及国际形势的发展,而忽视了国内的基本国情和现实需要。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所长邢广程结合苏联解体的案例分析了国内和国际两个大局相结合的重要性,他认为,苏联解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其在运筹国内和国际两个战略布局的时候,顾此失彼,着重于和美国在国际上的较量,而没有对国内问题的解决采取非常有效的措施,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邢广程还谈到,虽然中俄两国是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了许多战略共识,但双方在国际秩序上的分歧也是明显的。中国方面认为,中国是当今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建设者和贡献者。但在俄罗斯方面,如普京所讲,当今的国际秩序极不合理,俄罗斯不能接受。目前来看,这个分歧还在继续扩大。

中央外办原副主任、空军中将陈小工首先对建国 60 多年来我国的重大对外战略决策进行了梳理和分析,他认为,尽管我国曾经有过许多实施重大战略决策的成功经验,但我们未能充分从中提取归纳,形成一套丰富的理论体系。他认为中国的国际战略研究需要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更重要的是,国际战略研究要落地,即除了在宏观层面进行谋划和布局以外,还要对具体的实施手段、操作步骤进行规划。他同意杨小茸的观点,国际战略研究应包括重点难点问题的研究,并指出这些研究应具有可操作性和博弈性。

北京大学社会科学部副部长王周谊认为,当前,我国的国际战略研究应该侧重于寻求一种避免因中国取代美国而带来战争的方式。同时,中国人的品性决定了我们有智慧寻求一种阴阳平衡之道,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

与会者也对相关研究中存在问题进行分析。杨小茸认为,我们对一些关键性的国家或者在地区事务中起到领头羊作用的国家研究不够,而这些国家恰是中国国际大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邢广程认为,中国的边疆问题和国际形势应紧密联系在一起,但就目前研究现状来看,两者脱节严重。翟崑认为,国际战略研究面临的尴尬局面是战略的落地缺乏技术支撑,技术转化的过程中缺乏战略指导。

在谈到国际战略谋划中部门利益的问题时,王逸舟认为,国际战略研究应首先统筹三大强力部门(外交、军事、商务)之间的关系,并把各个部门、各个方面的战略和我国的总体需求和中长期发展目标进行对接。杨小茸认为,各部

部门对于大战略存在分歧,其原因在于各部门的出发点和分析角度不同,但关键是要清楚国际战略的目标不是为了维护部门的利益,而是为了维护国家的总体利益。对于国际战略筹划如何超越部门利益,唐永胜建议,就外交和国防来讲,把两者分别提升至大外交和大国防的层次,使两者得以在大战略层面进行筹划。

三、地区国别研究与国际战略

与会学者认为,国际战略研究应当把基础研究特别是地区国别研究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我国的地区国别研究也存在一些问题。杨恕肯定了地区国别研究与国际战略的紧密关系,并从中亚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地区国别研究中存在的问题:第一,研究视角较窄。就中亚地区的研究力量来说,中国对中亚基本国情研究不足,对国别研究过度集中在外交政策领域,忽视了对文化、政治、经济的研究;第二,研究思路不甚清晰。例如,他认为不应把周边关系、周边环境 and 周边国家三个概念混为一谈;第三,在周边问题上,对领土主权与安全的优先次序的判断不够清晰。第四,对基础研究的重视不够,缺少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跟踪研究。

云南大学缅甸研究中心主任李晨阳教授从东南亚地区研究的角度,对我国国别研究中存在问题进行分析和归纳:第一,动力机制问题。具体表现在我国一些学者过度迎合大众和媒体的口味;第二,对国家政策的准确理解不够,导致政策研究没有针对性和有效性;第三,没有处理好点和面的关系;第四,以中国人的认知方式简单套用。李晨阳还就中国对东南亚的战略表述和行为方式进行分析,并认为中国与东盟合作的一些战略表述难以被对象国或其他国家理解。同时,我国与东盟之间签署的诸多条约和协议是否最终有利于我国处理对外关系值得评估。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关贵海副教授认为,第一,实现我国的战略利益,需要建构既有说服力,又能讲得通的话语体系;第二,边境地区特殊的经济和人文环境导致中央政策和地方执行之间出现脱节。关贵海就“命运共同体”等一些战略术语的表述提出了不同见解。他认为,关于“命运共同体”本身及其内涵和外延的表述可能存在问题,但这是可以理解的。原因在于它是一种新的话语体系,需要我们在对外阐释的过程中逐步调整。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钱雪梅对地区局势和国际战略的关

系进行分析。她认为,国际战略对地区局势具有塑造力。地区局势主要受到三类行为体的国际战略之影响。第一类是大国;第二类是地区国家;第三类是非国家行为体,包括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各种形式的政治伊斯兰激进主义力量等。在这三类行为体中,大国和地区国家的战略已经受到广泛关注,但是我们对非国家行为体的战略研究非常薄弱。她建议,对非国家行为体的国际战略进行有针对性的研究。

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系主任韩召颖教授在总结了国际战略研究的多元性后谈到,地区国别的研究不仅需要扎实的语言背景作支撑,而且需要相关学科的配合。国际战略研究要解决现实需求和学术研究的关系。

四、全球问题与国际战略研究

与会者认为,在当今时代,全球问题发展态势越演愈烈,迫切需要我们拓宽视野,从非传统安全、全球治理及世界经济角度思考国际战略。

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余潇枫教授就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战略意义进行发言。他认为,非传统安全的战略意义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非传统安全都是全球性的,它正在改变国际权力结构,特别是在消减美国的霸权;第二,非传统安全正在解构国家的主权。战略问题研究以国家主权为本位,而国内问题国际化和国际问题国内化引领我们把超主权作为未来研究的重点。以后的全球治理更多的是对超主权和超国家能力的建构;第三,国家中心转向了以人为中心。第四,非传统安全威胁对政权有间接影响。他赞同钱雪梅提出的国际战略研究的框架应该增加非传统安全的维度的看法。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黄益平教授在谈到世界经济研究的战略意义时,从三方面进行分析:第一,经济规模会对国际战略产生重要影响。21世纪前十年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发展规模的判断和预估改变了许多国家对中国的看法,导致“中国威胁论”在美国盛行。国家经济规模的变化使得很多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国际关系、国际战略发生根本性改变;第二,经济结构的变化对国际关系产生直接影响。通过对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经济互动,以及澳大利亚与中国经济结构互补的分析,黄益平认为,这些国家在对华关系上有前后不同或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表现;第三,供求关系和汇率会对国际关系产生影响。中国从小国经济发展成大国经济,在此过程中,中国汇率政策的调整和供

求关系的变化 ,都对会对当今国际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雷少华博士对战略研究与细节研究的关系发表了评论。他认为 ,战略研究必须建立在细节研究的基础之上 ,细节研究是宏观战略研究的支柱。雷少华结合美国学者在我国新疆调研的案例 ,强调细节研究和田野调查的重要性。他同时认为 ,从反恐角度来说 ,美国对中国新疆的人口结构、地理因素、民族分布、恐怖主义等全面了解并非对中国百害无一利。因为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非传统安全威胁迫切需要我国和西方国家开展合作 ,同时 ,这些合作也有助于促成战略研究的落地。

贾庆国对上述观点进行总结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 ,霸权和全球治理之间的关系并非是单向的 ,霸权国家参与全球治理并不意味着本国一定受到削弱。美国把其他国家召集起来参与全球治理 ,主要目的是减轻本国的治理成本 ,借力来维护国际秩序 ,从而达到维护本国利益的最终目的。当然 ,在这个过程中 ,如果美国采取单边主义的做法 ,排斥其他国家参与全球治理 ,反而会得罪他国 ,从而消耗本国实力。总体而言 ,美国对华政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力争避免后一种情况 ,主观上愿意实现双方合作 ,从而利用中国的力量和资源帮助美国维护其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国国内的普遍看法认为 ,美国总是想方设法与中国对抗 ,这似乎并不完全符合两国关系的现实。